

## 外語教育與社會精英 以日治時期高等教育的外語課程爲中心

鄭麗玲

### 摘要

近代高等教育與普通教育不同之處，在於強調學習較高深的專門知識，這些系統化的專門知識，在進入本國之前，多半以幾個西方典範國的語言書寫，因此非西方國家在致力「近代化」的同時，莫不重視熟悉這些國家語文的外語能力。本文探討在日本影響之下，臺灣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外語課程內容，以及學生的學習情況。日治時期臺灣的外語課程在高等學校（大學預科）—（臺北）帝國大學這一高等教育系統頂端，是比較受到重視的。因爲這一系統的教育理想是要訓練帝國知識分子當中最頂尖的階層，他們必須具備至少兩種外語能力，不僅要能以這些外語爲工具，吸收他國頂尖的知識，研究各種學問之理論與技術，更要能從這些外語中培養廣闊的見識，成爲支持國家發展的精英。高等教育專門學校的外語課程，則有針對學問的實用地區來學習，而非學術來源國的現象，顯示這些學校的學習目標著眼於「致用」，而不是窮究某一學問蘊奧之「研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隨著德國戰敗，宣告德國學術時代結束，美國（英語）學術霸權更形穩固。對於第一外語及第二外語課程受到高度重視，可說是日治時代臺灣高等教育的特色，而究其緣由則可歸因明治維新以來對高級知識分子教養的理想。

**關鍵詞：**外語教育、第二外語、臺北帝國大學、專門學校、高等學校與大學預科

##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lites: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in Advanced Education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Li-ling Cheng<sup>\*</sup>

### Abstra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dern advanced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is the emphasis on the study of more profou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hich the majority is usually written in some distinctive Western country's language before it is introduced into our country. Therefore, while non-Western countries strive for modernization, they also focus on the potentia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digenous to these countries. The following content focused on the effect of the earliest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and students learning conditions in the modern Taiwan advanced education syst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wan's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in Higher Schools (university preparatory) and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 the peak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ere all highly respected. Since this ideal education system was created to train the highest class of imperial intellectuals, they had to attain the knowledge of at least two different foreign languages. They not only had to utilize these languages as tools, acquire top knowledge of the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search diverse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but also had to cultivate a broad view of knowledge from these foreign languages, and become new elites to support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The was a phenomenon that college's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targeting on practicality of the knowledge rather than learning the country of origin demonstrated that the goals of these schools were set on "applying the knowledge" and not on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the knowledge". After World War II, Germany was defeated and this announced the end of their academic era. Thus, America's (English) hegemony in the academic world became more stabilized. The greatest feature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 its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

emphasis on learning the knowledge of two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 reason behind this came from the Japanese Meiji Restoration's ideal of nurturing high-class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First foreign languag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College, Higher school and university preparatory.

## 外語教育與社會精英 以日治時期高等教育的外語課程爲中心\*

鄭麗玲\*\*

### 壹、前言

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以船艦與大砲的軍事優勢打開亞洲各國的防衛，此後，如何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社會制度，並將之融入本國社會與文化之中，成爲東亞各國不得不面對的難題。其中西方科學、文化發展中心的高等教育制度，成爲亞洲各國主政者培養自身政權知識力量的工具，也是與西方對話互動的重要窗口。

清末中國在一連串戰爭失利，割地賠款的政治、外交挫敗中，終於發現中國船不堅、砲不利，無法與英、法等國相抗衡，自強運動標榜師法歐美等國的科技，「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是要師法外夷的優良技術，聘用外國顧問，學習造槍鑄砲、與西方人談判等，都必須擁有相當嫻熟的「洋語」能力，遂設置「同文館」、「廣方言館」以培養翻譯與外交人員，成爲近代中國官方最早的外語教育之一。

約和中國自強運動同一時期，德川幕府掌權下的日本也受到西方大砲強迫開港，結束鎖國時代，在經濟混亂與社會不安中，幕府企圖加強與列強各國的交流，設立「蕃書調所」教授西學及翻譯外交文書，此外並成立

\* 拙稿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之意見，對諸多疏漏、錯誤與不足之處加以改正，謹此誌謝。

收稿日期：2003年8月28日，通過刊登日期：2003年11月27日。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開成所」，將原本偏重自然科學的西學，擴展到哲學、政治、經濟等方面，成為日後明治政府近代大學成立的基礎。<sup>1</sup>政治上，各地雄藩與下級武士開始一波「尊王攘夷」的政治運動，最後對外的攘夷失利，轉變成對內的「尊王倒幕」，結束了幕府政治，開啓「明治維新」時代，積極學習西方法律制度與科學技術。

非西方的國家採用西方模式的大學制度，通常呈現兩種方式，第一種是「櫥窗瀏覽」模式（window-shopping），採用這種模式的通常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些國家可以自主的瀏覽歐美各國不同的大學制度，決定採用那一國或將那一部分的學術制度引進本國，因此常呈現將各國不同的大學制度局部借用，拼裝融合成為適應本國的模式。或者以某一國的制度為主，佐以其他國家的局部制度。

第二種是「全面介入」模式（involvement）。非西方國家自願或非自願地採用特定的西方模式，作為本國大學制度的典範。「全面介入」的模式接受國與典範提供國之間關係密切，通常是在殖民地時期由殖民母國引進該國大學模式，教員來自母國，使用的教學語言是殖民母國的國語。非殖民地情況的「全面介入」模式，典範國也往往提供種種技術交流，如交換教授與學生，可以頒授類似學位的課程結構，甚至提供平行就業機會。<sup>2</sup>

雖然「全面介入」的模式將整套大學系統照搬至接受國，但是為適應不同地區的情況，實際上並無法如實複製。以殖民地的情況為例，殖民地雖然複製殖民母國的大學模式，然而由於種族、宗教、文化、社會的種種差異，勢必要作局部裁修。更重要的是，殖民者往往重視對其殖民統治有助益的部分，而刻意忽略可能危及統治利益的部分。

<sup>1</sup> 大久保利謙：《日本の大學》（東京：創元社，1943年；玉川大學1997年復刊），頁164。

<sup>2</sup> 如日本戰後在美國占領時代的教育改革，全面否定戰前日本帝國大學體制，學制也整個轉向以美國大學體制為標準。舊制高等學校精英主義太濃厚，不符合美軍占領軍民主化的教育改革要求，帝國大學制度則因有強烈的官僚性格，均成為美軍占領期的改革目標，於戰後日本高等教育體制中消失。

西方近代大學可歸納出幾個不同類型：(1)英國型：以少數精英為教育對象，具有學寮教育傳統。學生多被要求住宿，師生除了課堂上的授課時間之外，在生活上也有聯繫，相處時間長。(2)德國型：19世紀起德國為快速提昇國力而產生以研究為大學主要機能，重視研發的大學模式。(3)美國型：20世紀出現融合英國、德國兩種模式，創立研究所制度，大學朝多樣性發展，並且將大學教育普及至一般民衆。<sup>3</sup>除此之外，擁有悠久歷史之古典大學的法國型也不可忽視，這些大學形式在十九世紀末經由傳教士或帝國主義的力量傳到亞洲，並在不同國家被短暫或長期地實施。

臺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始自日本統治時代。<sup>4</sup>日本本國的教育近代化，也是在統治臺灣不久之前才建立，而其制度仿照幾個西方強權。日本的高等教育是上述所提的櫥窗瀏覽模式。但對二十世紀初的臺灣而言，由於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則是日本模式的全面介入。日本如何在十九世紀末吸收這些不同的大學形式與臺灣戰前學制密切相關。

近代高等教育與普通教育不同之處，在於強調學習較高深的專門知識，但是這些系統化的專門知識，在進入本國之前，多半是以幾個西方典範國的語言書寫，因此非西方國家在致力「近代化」之餘，莫不重視熟悉這些國家語文的外語能力。臺灣的例子則更為特殊，由於被日本殖民統治之故，學生在小學階段實際開始學習的「國語」（日語），實則為全然非本地語言的外國語。對當時的臺灣學生而言，日語之外任何一種外語學習，都是第二外語。雖然，本文並未將「日語」列入外語的論述範圍，不過吾人在討論此一時代要放在心中的前題。

本文試圖探討在日本影響之下臺灣近代高等教育最初的外語教育課程、學生的學習情況及其影響。但是，戰後初期學制與教學用語改換時期

<sup>3</sup> Philip G. Altbach：〈扭曲的根：西方對於亞洲高等教育的衝擊〉，收於伍振鶯主譯：《亞洲大學的發展—從依賴到自主》（臺北：師大書苑，1990年），頁8-9。

<sup>4</sup> 劉銘傳在臺灣推行新政時，曾成立短暫的「西學校」，學生必須學習外語。不過，旋因劉氏去職，繼任者邵友濂以西學校花費龐大，卻無具體成效關閉。

的歷史變遷，能讓吾人比較出日治時期高等教育外語課程的特殊性，因此在論文最後一部分將延伸到1955年，選擇這一年份僅僅是遷就作為對比資料的臺大課程表，目前可以較全面追蹤的年代自1954年開始。

## 貳、教育近代化與外語學習

### 一、中國的近代高等教育

中國與日本是亞洲國家中少數未受到殖民的國家，擁有自主權選擇高等教育體制，此外，亞洲的印度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則被動的引入了殖民母國的教育制度，前兩者和臺灣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印度的殖民地教育則可以和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教育對照。因此吾人應先簡單地了解這些不同國家的高等教育。

鴉片戰爭以後清朝對外屢戰屢敗，各項對外國的交涉、議和、簽約、通商的事務紛沓而來，在辦理這些當時被稱為「夷務」的過程中，清朝開明派大臣們開始感到缺少相關外語人才的問題。恭親王奕訢在「奏請設同文館折」中說明，要了解各國國情，必定要先明瞭其文字語言，才不會受人欺騙蒙蔽，各國莫不重資聘雇中國人講解中文文義，但中國迄今卻仍沒有熟悉外國語言文字的人才，無法知曉外國底蘊。<sup>5</sup>1862年成立的同文館陸續設立了英文館、法文館、俄文館以及東文（日文）館。在自強新政下創辦的各種新式學堂一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武備學堂、水陸師學堂、船政學堂、電報學堂等等。其中同文館、廣方言館主要是外語學校，創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養精通外語的翻譯人才。<sup>6</sup>不僅這些以學習、翻譯

<sup>5</sup> 喻本伐、熊賢君：《中國教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5年），頁498。

<sup>6</sup> 此一時期所創辦的外語學校還有1887年新疆俄文館、1889年琿春俄文書院、1893年在湖北創辦的自強學堂，以及1888年清法戰爭後劉銘傳在臺灣創辦的西學堂。喻本伐、熊賢君：《中國教育發展史》，頁501。

外國語言、著作的學校重視外語教育，攸關軍事近代化的新式軍事學校與以技術學習爲主的各式學堂，亦都有針對不同學習對象國而對學生要求不同的外語素養。基本上海軍（水師）因爲以英國爲典範國，要求的外語爲英文，甚至天津水師學堂專業課程（如算學、幾何原本、代數、地輿圖說、駕駛諸法、測量天象等等）的教學用語是用英文。陸軍（陸師）則不然，陸軍學習典範國爲德國，因此外語要求德語，並請來德國軍官擔任教師。以學習西藝（技術）爲主的學校也因不同的學習典範國，對於外語的要求不同。例如福州船政學堂要求英、法兩國語言，電報學堂則是英文課程。<sup>7</sup>但是這些外語的學習情況如何，是否能夠馬上適用於外籍教師的專業教學，恐怕是很有問題的。

1904年在這些新式學堂陸續創設的同時，中國也開始仿效日本，嘗試定出新式教育的學制，先有由張之洞、張百熙、榮慶擬定「奏定學堂章程」。學制規劃出幾個教育階段，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及大學預科—大學堂（分科大學及大學選科）。高等學堂以教授大學預備科爲主，修業三年，計畫每一省都有一所高等學堂。從課程來看是將主要的外語學習放在高等學堂。高等學堂預科分三類，預備入學經學、政治、文學、商科等學科者爲第一類，預備入學格物、工、農等學科者爲第二類，第一類及第二類均以英語爲必修，任選德、法語，預備入學醫科者爲第三類，則以德語爲必修，英、法語任選，並另有拉丁語一科。專業領域的教育則是安排在大學堂，也就是各分科大學下，除醫學門修業四年之外，其他各門均修業三年。<sup>8</sup>雖然有這樣宏大的近代教育計畫，實際上除了京師、兩湖與浙江高等學堂之外，大部分學堂都面臨招生困難，沒有夠水準的師資，更缺乏教學與管理人才的問題。雖有高等學堂之名，卻不足以成爲大學的預備教育。

清末的這一套學制很明顯的受到1870年代以來日本學制的影響，不論

<sup>7</sup> 喻本伐、熊賢君：《中國教育發展史》，頁502-504。

<sup>8</sup> 霍益萍：《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70-71。



是課程的名稱與分科，大學預科制度當中外語教育的要求，以及京師大學堂作為高等教育的頂端，就如東京大學在明治時期的地位一般，均能看到明治初期日本學制的影子。而這個時期也正是中國人前往日本留學潮興盛之時。

除了官學之外，私人興學與教會學校也開始蓬勃發展。私人興學較著名的有馬相伯創立的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以及嚴修、張伯苓的南開學校（南開大學前身）。知名的教會大學則有金陵大學、齊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另外，以庚子賠款成立的清華大學雖然是官立，但由外交部負責，民國初年該校的教學用語，除了國學一門用國語之外，全部使用英語，從教學用語的角度而言，尚未能完全獨立自主。

## 二、日本的近代高等教育

由於日本成功且快速地建立近代教育體制，完成揉合西方幾個大學模式的日本型大學，1900年後逐漸成為中國留學生的主要留學國。

日本早在1872年（明治5年）明治政府即公布學制，該學制的設計仿效法國，以學校行政基礎採學區制區分，將全國分為八大學區，每一學區置大學校一所，一個大學區又分32個中學區，各置一中學，一個中學再分21個小學區，各置一所小學校。全國將有8所大學，356所中學及5萬3千7百60個小學校，平均人口13萬人有一所中學，人口600人一所小學。<sup>9</sup>該學制計畫龐大，顯示明治政府採用近代學制的強烈企圖，但以當時的人力與財政實際上不可能推行。

在日本全國設置八所大學，首先遭遇的困難是沒有本國教師能夠教授這些西方技藝與知識，即使請來具備專業知識的外國教師，學生亦欠缺足以吸收的這些西學的外語能力。因此，在接受近代高等教育之前，先決條

<sup>9</sup> 大久保利謙：《日本の大學》，頁212-215。以全國劃一的方式規定的學制，由於過於僵化，有實際推行之困難，1879年終被教育令所取代。

件是要充分的學習某一外國語言。1873年明治政府公布「學制二編追加」，遂定出「專門學校」的相關規定。

專門學校雇用外國教師，教授專門學問，在當時教育主政者的構想中，此類學校與師範學校相似，是爲了吸收外國專門學問，培養日後以本國語教學的教師。這些「種子教師」培養機構是學制之外的洋語學校，原本僅是過渡性質的專門學校，最後卻成爲「帝國大學」（二次大戰結束前的東京帝國大學即今之東京大學）的前身。

明治初期日本高等教育相關的法令，遠遠趕不上高等教育現實的變化，經常是事實先行之後，法令才隨之規範，政策搖擺不定。1873年根據文相大木喬任之構想，制定專門學校相關規定。該法公布之際，東京成立了兩所專門學校，一所爲設置有法、理、工等學科的開成學校，該校外籍教師以英語教學，學生必須先修習英語；一所以德語爲教學語言的東京醫學校。以外國人教授、外語及外文教材培養出第一批師資，確保將來可以有日本教師以日語爲教學用語，成立日本的大學。

但是，1877年（明治10年）加藤弘之出任開成學校綜理（相當於校長）一職，同年4月在加藤的建議下開成學校與醫學校合併爲東京大學，設置有法、理、醫、文四個學部。東京大學的成立打亂了大木喬任對大學與專門學校的構想。對當時許多以成爲邦語（日語）大學爲目標成立的私校更是致命的打擊。原本設想專門學校是「西洋」學校，亦即以外籍教師用外語進行教學，是西方大學制度引進期間的過渡性機構。大學則爲本國教師以本國語進行教學與研究。但東京大學在成立之初，仍舊是一所以外語教學的洋語大學校，卻成爲日本唯一之大學。

關於日本二次大戰結束前高等教育的特色之一——高等學校，其開端應是在1883年（明治19年）將原本東京英語學校（東京大學預備門）依據新公布的中學校令改爲第一高等中學校。<sup>10</sup> 1872年（明治5年）學制公布後，

<sup>10</sup> 東京一高有許多爲人津津樂道的事蹟，幾乎是戰前高等學校群馬首是瞻的老大。

日本許多地方都成立英語學校，以快速吸收西歐文化與學術，東京英語學校也是這波風潮下所成立的專門學校之一。但是如前所述，東京大學的成立，打亂了原本對於大學與專門學校規劃的構想，1877年東京英語學校在東京大學成立之後，改為「東京大學預備門」，變成入學東京大學的預備教育。不過，「東京大學預備門」極力擺脫大學過渡機構的身分，以成為獨立教育機構為目標，並標榜德育方面的教育，這也成為日後高等學校特性之一。

高等中學校制度的創始者是明治時期有名的文部大臣森有禮。森有禮曾提出他對高等中學校的期待，他指出中、小學校的教育目的是普通實用教育，高等中學校則不然，畢業之後並不進入社會，而是要進修更專業的學科。換言之，高等中學校是要培養社會上流人士成為官吏、經商或學者的養成之所。其重要目標是要當時急欲富國強兵的日本，培養各方面領導人物的精英教育機構。<sup>11</sup>當然，高等學校與大學的設計，一部分也有明治政府引導傳統士族，經由此種「貴族式」的教育體系之轉化，以現代統治技術之行政官員或科學知識之技術官僚的面貌，成為支撐明治政府的新階層。

發展成為日後日本之大學的洋語學校大都重視外國語教育，有預科制度，以學習外語為主。不過，不同專業背景因為學習的典範國不同，所重視的外語能力也不同。醫學、法學因為以德國為師而重視德語。<sup>12</sup>東京帝大工學部前身之一的工部大學校，外國教師大都聘自英國，則比較重視英語教育。該校早期完全採英式教育，學生全部住宿，睡在床上（而非日式榻

<sup>11</sup> 高橋佐門：《舊制高等學校の教育と學生》（東京：國書刊行會，1992年），頁1-4。

<sup>12</sup> 日本高等教育的模式，法學最早以法蘭西法律為師，醫學為德國，農學為美國，工學（機械學）是英國，理學為德國。但後來明治憲法採用由普魯士建國成功的德國式憲法（這又和此時普魯士數度擊敗法國，成為歐陸新霸主有關），日本法學教育與訓練遂轉為德國模式。農學也自明治十年代起轉而招聘德國人教師，當時認為美國採粗放式農業，較不適合日本，還是德國農學比較適合日本。

榻米)，三餐皆洋食，教學用語全部使用英文，沒有翻譯。其中，最特殊的外國語學校應屬札幌農學校，其創校首任校長是美國人，<sup>13</sup>因而將一整套美國農學的制度移植到北海道的札幌農學校，重視學生的英語能力當然不用說，連日常生活及精神生活都深受影響。<sup>14</sup>早期札幌農學校學生在日常生活即被要求過西方人的形式，早餐沒有米飯納豆，而是喝牛奶吃麵包。由於校長篤信基督教，雖然有不准向學生傳教的限制，但仍有許多人因而信教。

### 三、印度的近代大學

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地教育值得注意至少有兩個理由。首先，英國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最重要的殖民帝國，擁有廣大而眾多的亞洲殖民地，其殖民地政策亦為日本研究參考之對象。第二，二十世紀初印度知識分子的反英民族運動，使得英國在印度的高等教育，經常被日本政府拿來作為失敗的借鏡。

十七、十八世紀英國在印度的教育，除了教會的傳教活動之外，主要是為了英印混血兒的教育而設置，但大約在十八世紀末東印度公司開始考慮對印度人採取何種方式之教育。英國人對於印度人的教育有兩派看法，一派為東方主義派（Orientalism）。東方主義者認為東印度公司的印度教育不應成為英國國教傳教的計畫，也就是對印度人的教育沒有必要急迫地教授西洋知識，而應該仿印度教（Hindu）與回教徒統治者的方式，獎勵印度傳統梵語及阿拉伯語的古典學問。

<sup>13</sup> 札幌農學校是北海道帝大、北海道大學的前身，首任校長Clark (William Smith Clark)，是美國麻州州立農業大學校長。蝦名賢造：《札幌農學校》（東京：新評論，1991年），頁35。Clark擔任札幌農學校的時間僅一年，但卻留下深刻影響。其名言：Boys Be Ambitious! 成為戰前日本全國學生最流行的名言。

<sup>14</sup> Clark主張以聖經作為該校的精神教育修身課本，曾與當時北海道長官黑田清隆有一番爭執，後來黑田讓步，默許使用聖經。此後該校每日上課前祈禱，拜讀聖經。

另一主張是以福音教派傳教士、自由主義者為代表的英語主義派(Anglicism)。英語主義派希望以英語為教學語言，傳授西洋知識與西方價值的教育。<sup>15</sup>東方主義派的教育措施在宗教上採取中立，避免引起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之反感，徒生統治困擾，因此獲得以商業利益為統治原則的東印度公司之支持。此一時期成立的加爾各答回教大學(Calcutta Madrasah)與班那拿梵語學院(Benares Sanskrit College)等古典語文學校，均是此種教育精神下的產物。

但是以英語為教學語言或以古典語為教學語言的爭論仍未中斷，1835年起印度總督接受公共教育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Instruction)所提的備忘錄，該備忘錄主張以英語進行高等教育，教授西方學藝(art)與科學。1844年印度政府宣布凡接受英語教育者得優先為殖民地政府聘用，於是西式教育成為進入公職與專業之媒介。<sup>16</sup>從此英國在印度的教育制度與教育精神，在培養、製造出一群有著印度人膚色，但精神上卻與英國紳士接近，擁有英國品味、觀點、道德的新智識階層，他們成為介於英國統治者與印度一般民衆之間的通譯階層。

1857年加爾各答、孟買與邁得拉斯三所現代大學成立，仿照倫敦大學的模式。所謂的倫敦大學模式乃因應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後，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異於古典貴族的教育要求。由於創立於十二、十三世紀的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仍舊保持傳統以貴族與紳士階層為主的教育，因之這些新興資產階級遂推動興辦近代大學，1818年於倫敦創辦大學學院，1836年聯合其他學院，正式成立倫敦大學。<sup>17</sup>此後英國各地所成立的「近代大學」(相對於古典大學)大都具有不受宗教信仰限制、重視科學技術、與地方發展密切聯繫，以及由學院發展成大學的特色。倫敦大學本身僅是一個各教育機構

<sup>15</sup> 藤謙敬：〈インド高等教育の一考察〉，收於多賀秋五郎編：《現代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東京：多賀出版株式會社，1983年），頁405-406。

<sup>16</sup> Aparna Basu撰，潘慧玲譯：〈印度的高等教育：殖民地風格及其他〉，收於伍振鶯主譯：《亞洲大學的發展—從依賴到自主》，頁218。

<sup>17</sup> 吳文凱、楊清漢：《比較教育學》（臺北：五南出版社，1992年），頁462-463。

之聯合體，負責行政、擬定課表、執行考試，教學與研究則落在各學院。

印度的三所西式大學深受倫敦大學之影響，三所大學的大學法都與倫敦大學一樣有學藝、法律、醫藥與土木工程四學部，最後才增設理學部。大學是加盟型不負責實際教學或制定教育目標，而是對各加盟學院正式修畢一定課程的學生實施考試檢驗，並對合格者授予學位。各學院均以英語為教學用語，多數學院的校長與職員直接自英國招募。

十九世紀末印度國民會議派（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成立並開始批判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他們要求印度人與英國人平等，以及改善大學教育。他們抨擊印度政府對大學採取中央集權式的統制。當時印度的大學由中央或省立法所通過的法案設置，經費由政府補助。大學在官員的控制之下，省長或總督為大學校長，副校長及評議會中大部分成員都由政府提名。

1905年國民會議提出自治的要求，迫使英國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印度諸大學的加盟型大學方式不能滿足印度高等教育急速擴充進步的腳步，1913年廢止加盟型大學的形式。一次大戰後印度的政治、社會、文化均進入一個新時代，1919年印度統治法公布，印度政府將部分權利移轉給州政府，是所謂兩頭政策（Diarchy）。<sup>18</sup>其中教育事項也包含在內，州政府掌握大學行政權。

從印度近代大學教育的建立過程可以看出，雖然印度的大學移植英國的大學制度，但在此一制度下大學高度自主的精神卻沒有被複製過來。英國的大學享有許多的自主權力，但是統治印度的英國官員卻主張印度政府基於教育與政治的理由，對大學嚴格控制是絕對必要的，大學自主在教育上是不智的，且在政治上是危險的。印度大學在發展之初，並無印度本土的自主性可言，外來性格十分明顯而強烈。印度的大學有兩個主要功能，

<sup>18</sup> 但是若干全國性教育與研究機關仍委諸中央政府之手，印度民族運動的國民會議派則抨擊英國政府此一兩頭政策包藏強化對印度分割統治之禍心。參閱藤謙敬：〈インド高等教育の一考察〉，《現代アジア教育史研究》，頁423。

即提供政府通過合格測試的學生與傳遞外來文化。大學成爲強化英國文化、知識與政治統治的工具。

英國在印度所建立的大學制度，重視通識與文雅教育（general and liberal education），而忽略科學與技術教育，使得印度的大學教育培養的是辦公室文書人員，而不是訓練科學家、技師或農業專家。<sup>19</sup>印度人民進大學是爲了謀得印度政府機構的公職，一旦受教育的人數超過公職所能吸收的數量，工業界無法吸收這些受教者，無法進入公職系統的知識分子卻遠離了其他印度民衆。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英國在印度所進行的殖民地教育，雖強化了印度智識階層對英語的依賴，但卻也培養出一批新知識分子。他們吸收了西方觀念，能以其智慧與知識自由的表達思想，超脫複雜的地域利益，思考整個印度的未來，並對英國殖民統治提出強有力的批判。他們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嘗試根據印度本身的需求，建立既能吸收西方知識而又不會導致受西式教育的知識分子遠離貧窮土地與民衆的方式。

英國在印度所採行的高等教育，以及二十世紀初大英帝國在殖民地所面對的挑戰。顯然地，後進殖民帝國的日本政府對西方國家殖民地教育的觀察與研究，是爲了避免重蹈覆轍而非仿效。

### 叁、外語及第二外語的課程與教學

臺灣在清末的自強新政中，曾在劉銘傳主政下創立了西學堂、電報學堂，也有成立日（語）學堂的計畫，不過這些晚清的新式學堂由於設立時間短暫，並沒有留下太多影響。在日本人統治之前，臺灣的近代高等教育幾乎是一片空白，日本在這一方面沒有對手，不像有些殖民地已有教會等

<sup>19</sup> Aparna Basu撰，潘慧玲譯：〈印度的高等教育：殖民地風格及其他〉，《亞洲大學的發展—從依賴到自主》，頁224。

其他高等教育機構來競爭，日本在臺灣近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有很大的揮灑空間，或者應該說有更強的控制力。

1895年臺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殖民統治之初臺灣教育以初等教育及實業教育為主。1918年臺灣教育令公布，雖然殖民政府仍希望將臺灣人的教育局限在以中低階實業教育為主，但臺灣人高等教育的需求則日益增高。臺灣教育令公布後，有數所實業教育機構改制為專門學校，分別是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農林專門學校），總督府醫學校改為醫學專門學校，又創設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根據專門學校令，這些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技藝為主。

和印度等其他殖民地一樣，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無法自主的決定教育模式，教學語言當然採用殖民母國的語言。因之，前述高等教育預科階段的語言要求，中、日兩國乃是在學習外國（以英、法、德、美）學術之初，聘用外籍教師，不得不然之要求，待本國專業人才培養出來之後，大學教育的教學用語也逐漸轉為本國人教師以本國語授課為主，高等教育預科外語課程慢慢也就轉變成對於高深學術研究的要求，而非學習該一學科入門的基礎。但是對臺灣人而言，不論是那一階段的學習，所有教學用語都是日文，只有學習了日文之後，才能透過日文去學習德文、英文、法文。在殖民統治沒有結束之前，日文不是為了學習新式教育的過渡性質的語言，這是臺灣的社會精英與中國、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的社會精英重要的不同。

1922年新教育令公布，臺灣開始準備設置大學並成立大學預備教育—臺北高等學校。根據新教育令所適用的大學令，大學教育是教授國家需要之學術理論及其應用，研究其奧蘊為目的。不論是大學教育或專門學校的教育，不同學門的學術理論或技藝應用，外語與第二外語教育都很重要。日本舊制大學教育通常將專門學科放在三年的大學本科，三年的高等學校預科（或兩年的大學預科）則以高等普通教育為主，外語及第二外語的訓練也在這一階段完成。以下吾人將從這些專門學校、高等學校及大學預科



課程，討論不同專業需求的外語教育差異。

## 一、大學預備教育的外語課程

### (一)臺北高等學校

根據「臺灣總督府高等學校規則」在高等科部分規定，高等科分文科及理科，文、理科之中再細分甲類與乙類，文理二科的甲類均以英語為第一外語、德語為第二外語，乙類以德語為第一外語、英語為第二外語。一般而言，文科甲類日後進入大學必須選擇法律、經濟方面學科領域，文科乙類則往文學發展，理科甲類則為理學或工學，乙類則以醫學為主。其中，臺灣人傾向就讀理科乙類，也就是未來大學主要以醫學為主。<sup>20</sup> 歷年臺灣人學生在臺北高校的比例除了第一年及幾年例外，大都在20%左右。以下為文、理科課程表：

<sup>20</sup> 臺灣人偏愛理科有種種因素，其中除了畢業後的出路考慮之外，由於文科要和母語是日語的日本人競爭，多數臺灣學生往往會發現他們在理科上比較容易贏過日本人。因此臺北高校理科臺灣人就讀人數遠超過文科。

表1：臺北高等學校學科目及每週授課時數表

## a.文科

## b.理科

學年 學科目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學年 學科目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修身	1	1	1	修身	1	1	1
國語及漢文	6	5	5	國語及漢文	4	2	--
甲類：第一外語 (英語)	9	8	8	甲類：第一外語 (英語)	8	6	6
甲類：第二外語 (德語)	4	4	4	甲類：第二外語 (德語)	4	4	4
乙類：第一外語 (德語)	11	10	10	乙類：第一外語 (德語)	10	9	9
乙類：第二外語 (英語)	3	3	3	乙類：第二外語 (英語)	3	3	3

\*括弧內的數字表配合學生的修課意願與該學年週授課數配合斟酌開設。

資料來源：《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10年版。

文科甲類的外語堂課數三學年分別為13/12/12，乙類則為14/13/13，因此乙類總修課數比甲類多3節。再細論甲類第一外語英語及第二外語德語的分配是9:4/8:4/8:4，乙類第一外語德語與第二外語英語的分配是11:3/10:3/10:3，同樣是第一外語，但乙類德語研修的時間遠較甲類英語課高出甚多，甲類第二外語德語的修課時間也比乙類英語高。理科的情況亦同，理科甲類英語／德語分配是8:4/6:4/6:4，乙類德語／英語的比重則為10:3/9:3/9:3。理甲類雖以英語為第一外語，對於第二外語的德語亦不輕忽，德語與英語的總課數相差很小。顯示戰前臺灣高等教育的高等學校體制中，不論是否以德語為第一外語，各學門都要求相當時數的德語課程，這與戰後全面以英語為理所當然的第一外國語有相當大的差距。

## (二)臺北帝國大學預科

根據「臺北帝國大學預科規程」，預科學科課程分四號表，第一號表為

文政學部預備入學者每週授業時數。第二號表為理農學部預備入學者各學年學科目及每週授課時數。第三號表為醫學部預備入學者，第四號表是工學部預備入學者。臺北帝大預科臺灣人學生比例較臺北高等學校更低，平均約僅4%。不論文、理科授課要旨均依臺灣總督府高等學校規則第八條至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五條之規定。<sup>21</sup> 以下是一至四號表的授課內容。

表2：臺北帝國大學預科外語每週授課時數表

a.一號表（文政學部預科）

學年 學科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英語	3	3	3
德語	11	10	10

b.二號表（理農學部預科）

學年 學科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英語	5	5	5
拉丁語	--	--	(1)

c.三號表（醫學部預科）

學年 學科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英語	3	3	3
拉丁語	--	--	(1)
德語	10	9	8

d.四號表（工學部預科）

學年 學科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英語	8	7	5
德語	5	4	4

\*括弧內的數字表配合學生的修課意願與該學年週授課數配合斟酌開設。

資料來源：《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6年版，頁110-115。

臺北帝國大學預科教育準照總督府高等學校規則，故在共同的學科如修身、國語及漢文、心理、法制及經濟、圖畫等部分的授課時數大都與高等學校相同。不過，各別的大學預科因依升進大學後的學部來分科，因此可以加強該學部所需之專業。

文政學部預科三學年英語：德語的外語分配是3:11/3:10/3:10，德語的授課時數相當高，此外在上表之外的授課科目中，歷史科的週授課時數亦較高等學校文科高，這都是特別因應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特色而採取的作

<sup>21</sup> 《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6年版（臺北：該校編印，1941年），頁103。

法，與臺北高校以全日本各地帝國大學之入學準備不同。進入本科之後也因專攻學門所需，另有其他外語課程。根據中村孝志的回憶，他們在臺北高校時代已經修英語、德語，但在文政學部則有兩年法語必修科，此外史學科的南洋史學講座是臺北帝大創校以來的特色，凡是進入該講座的學生，需要接受西班牙文及荷蘭文的訓練，以研究菲律賓及印尼方面的歷史。由於大學三年級要寫畢業論文，因此學生在一年級後半階段，開始利用午休時間，接受老師課外（如西班牙語）的語言速成訓練。到二年級就用這樣的西班牙語開始講讀史籍。在此同時，學生又被要求學習新的荷蘭語課程。三年級開始以西班牙文和荷蘭文交替為雙主修。因此據說南洋史學講座的學生，四年畢業乃至五年畢業的人占一半以上。曾經擔任史學科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教授是受美國訓練的移川子之藏，他在當時還很新奇的在開架式研究室中央擺了一個自由討論的沙龍，同該學科的南洋史教授（曾任文政學部部長）村上直次郎深深不以為然，認為學生根本不應該有那樣的閒功夫。<sup>22</sup>從文政學部南洋史學講座專攻所要求的外語課程來看，學生的語言課程相當沉重，而且立即需要派上用場，確實沒有多餘的悠閒，當然自由討論的沙龍可以促進學術討論與自由思考的風氣，則是村上直次郎所不能理解的。

二號表是理農學部的預備教育，與臺北高等學校理科課程表的差異最小。不過在外語課上高校理科甲類英語／德語分配是8:4/6:4/6:4，臺大理農學部預科英／德語分配是5:8/5:5/5:5，德語時數雖仍超過英語，不過時數相當接近，很難區分何者為第一外語、第二外語。三號表是醫學部的預備教育，英語／德語分配為3:10/3:9/3:8，其中德語授課時數也相當高，僅次於文政學部的一號表。

四號表為工學部的預備教育，外語中英德語的分配是8:5/7:4/5:4，是文政、理農、醫、工四學部中唯一英語的比重超越德語的學部。

<sup>22</sup> 中村孝志撰，陳例甫譯：〈臺北帝大的日子〉，《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臺北：臺大臺灣研究社，1996年），頁177-178。

高等學校、大學預科的外語課程，文政學部的學生在大學畢業之前要學英、德、法、荷等數國語文，農、醫預科的二、三號表都有拉丁語的選修課，這是因爲在動植物及醫學一些專用術語上，可能有需要用到拉丁文的地方。在預科教育就有三種外國語言課程，均足見當時高等教育對相關學科專門知識外語的重視。臺北高等學校在分科的高等普通教育上各種知識分配比較均衡，而預科因爲附屬於大學，則能針對臺北帝國大學學部不同的需求，如特別加強某一專業必備之外語或特殊的專業科目。因此，預科學生進入大學應較能進入專攻的學習狀況。

## 二、專門學校的外語教育

專門學校的入學者以中學畢業生爲主，和大學尤其是帝國大學體系以高等學校學生爲主不同，高等學校及大學預科介於大學與中學之間，而專科學校的教育較高等學校注重專業訓練，但學術專業程度卻又不及大學本科的深入。專門學校的學生也有考入臺北帝大，是學生來源中所謂的「旁系」。

### (一)醫學專門學校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前身爲總督府醫學校，是僅有中學程度的醫學教育，1918年以後改爲醫學專門學校，分預科四年，本科四年。臺北帝大醫學部成立後，成爲臺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時期，預科四年的外語課程是第一、二學年每週4小時英語，第三、四學年加強爲每週7小時，上課內容以閱讀、翻譯、會話、作文與文法等爲主，程度約和普通教育的中等學校相近。醫學專門學校本來就以培養在臺灣從事醫療工作的本地人醫師爲主，因此在醫學校時期一直是以臺灣人爲收容對象，而後附設有收容日本人的醫學專門部，共學之後醫學專門學校時期，臺灣人學生比例與醫學校時期獨占的情況不同，從資料來看，有越

來越多日本人進入就讀，自1926年臺灣人新生占74%，但是到了1940年以後數年新入學的臺灣人比例已降到50%以下。雖然如此，該校長期以來仍是以臺灣人學生占較大多數。

表3：醫學專門學校本科學科目及每週授課時數表

學 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學科目	英 語	6	--	--	--
	德 語	2	2	2	1

資料來源：《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大正9年版，頁40-44。

醫學專門學校另設有熱帶醫學專攻科，招收已有醫師資格者修業一年。熱帶醫學專攻以研究熱帶醫學為主的相關知識，如熱帶衛生學、防疫學、寄生蟲病學、殖民地衛生制度等，也有外語課程，要求修習外國語中英語、德語、中國語、馬來語任何一至兩科。<sup>23</sup>

## (二)高等農林學校

1919年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成立，預科三年，本科修業年限三年，1922年改稱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分農學科與林學科。高等農林學校甫成立的前三年，由於仍是臺灣人子弟與日人子弟分流教育，高等農林學校是臺灣人學生就讀的學校，沒有日人，但1922年共學之後，臺灣學生比例陡降為46%。<sup>24</sup>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後，高等農林學校改為臺北帝大

<sup>23</sup> 《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臺北：該校編印，1918年），頁44-45。

<sup>24</sup> 根據《臺灣總督府第二十六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統計課，1923年），頁82，大正11年（1922）該年度新生有19名日本人，22名本島人（臺灣人），5名外國人。不過以後各年的統計書都把1922年以後本島人學生數削除，到1925年才又有5名本島學生生的紀錄。順道一提，雖然1922年以後名義上說是「日臺共學」，但是共學前的日本人學校—商業專門學校，在1922年後，只有少數臺灣人學生入學，根據統計1922年新生仍是100%日本學生，次年也僅1名臺人新生入學，與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高等農林學校兩所原本收容臺人學生在共學後日本人新生比例入學情況有極大差異。

附屬農林專門部，分農學科與林學科。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後，高等農林學校成為臺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臺灣學生比例大約都不超過5%，甚或更低。從農學科與林學科的課表來看，農學科的外語課程僅有英語，林學科則有第二外語德語。以下是兩科的授課時數表。

表4：高等農林學校週授課時數表

4-1：農學科

4-2：林學科

學年 學科目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學年 學科目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英語	12	12	9	英語	15	9	9
德語	--	--	(6)	德語	--	9	(6)
以下略				以下略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一覽》大正14年版，頁47-52。

高等農林學校的第一外語英語，雖然農學科與林學科各學年的比重不同，但三學年授課總數都是33小時。第二外語則是德語，但是，農學科方面對第二外語的要求較低，僅安排在第三學年作為6小時的選修課程。林學科則在第二學年已經安排每週9小時的德語課，與英語上課時數相等，第三學年還有6小時的選修課程。

### (三)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創立於1919年，在該校設置規則中指出是為了在本島（臺灣）內外從事商業的男子所需要的高等教育。<sup>25</sup>在1922年新教育令的臺日共學以前，是一所明定招收日本人學生的商業學校，另一所設於臺南的商業專門學校，則以招收臺灣學生為主，但1929年隨即因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創設而廢校。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即使在1922年共學後，仍以日本人居多，從歷年資料分析，該校學生臺灣人比例不到百分之十，後來該校在

<sup>25</sup>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一覽》（臺北：該校編印，1919年），頁1。

本科之外設立了貿易專修科與東亞經營專修科，這兩種專修科招收的學生，則似乎有特別考慮日臺學生的比例，歷年入學的日臺學生約各占一半。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有預科三年，本科修業年限三年，入學資格要求17歲以上中學畢業者。1920年代日本經濟蓬勃成長，高等教育發展也很迅速，其中商業類科的專門學校設置為該時期主要潮流之一，在臺居留的日本人對此需求甚殷，臺灣的專門學校設立遂也搭上此波熱潮，1919年不僅成立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也在臺南設立以臺灣人爲主的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後者在1931年廢校。因此僅以臺北高商的課表來討論。

表5：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外語學科目及週授課時數表

學 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合 計
外 國 語	英 語	18	16	16	50
	德 語	(6)	(6)	(6)	(18)
	法 語	(6)	(6)	(6)	(18)
	中 國 語	(6)	(6)	(6)	(18)
	馬來語及 荷蘭語	(6)	(6)	(6)	(18)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大正15年版，頁10。

可能由於是以商業爲主的專門學校，對於語言相當重視。臺北高商的語言課程與其他專門學校相較份量加重許多。尤其，英語課程相當重。第二外語和前述農業、醫學專門學校第二外語課以德語爲主不同，除了德語之外，還有法語、中國語、荷蘭語及馬來語。甚至學校規章還指出爲了避免第二外語稱謂，好像是比較不重要，讓學生產生輕忽之感，因而改用原本的語言名稱，如馬來語、支那語。<sup>26</sup>規定必須再選修英語之外任一種外國

<sup>26</sup>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該會印行，1939年；南天影印，1995年），頁945。



語。臺北高商的情況與醫專熱帶醫學科頗為類似，蓋因當時日本的商業貿易地以中國大陸、東南亞為主要市場，東南亞國家除了英領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馬來西亞之外，印尼等地為荷蘭殖民地，當地人則為馬來人，越南則是法國殖民地，因此商業貿易上有中國語、馬來語、荷語及法語之需求。

#### (四)臺南高等工業學校

日本統治下臺灣的教育自20年代起幾乎追隨日本本國發展趨勢。1930年代，因戰爭爆發工業發展受到刺激而蓬勃發展，商業貿易則有受限之虞。日本國內的教育重心轉向工業方面操作與研發人才之培養，不少商業類科的專門學校轉而成為工業類科，此時臺灣也推動工業化，因之，總督府停辦臺南商業學校，改設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灣總督府高等工業學校規則中明定，高等工業學校是針對從事工業之男子所進行的高等教育。該校創設之初設有機械工學科、電氣工學科及應用化學科，招收中學畢業生。<sup>27</sup>從歷年的資料來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臺灣人學生，僅在創校之初的1931年，入學新生中有50%的臺灣人，但此後新生中臺灣人比例就呈現逐年遞減的情形，從次年32%一路下滑，到1935年以後每年均低於10%，臺、日學生之間的惡感與糾紛屢有所聞。<sup>28</sup>

表6：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外語學科目及週授課時數表

學 年 學 科 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合 計
英 語	6	6	12
德 語	6	4	10

<sup>27</sup> 《府報》第千百五十號，昭和6年1月15日，頁55。實業學校系統的工業學校若在學最後兩學年成績都為首位，也可經由校長推薦由口試方式檢定入學。惟人數有限。

<sup>28</sup> 根據校友回憶二次大戰期間少數入學的臺灣人學生和日本人之間曾有激烈的衝突，臺籍學生畢業後的出路也較日本人窄，許多大型日資公司並不願雇用臺灣人。

根據《府報》第千百五十號。

臺南高工學生修業年限三年，沒有預科制度，不論是機械工學、電氣工學或應用工學外語課堂數都相同，詳見表5。外語課程集中在前兩年進行。和其他類科如商業類的臺北高商英語及其他外語分別是40/18，高等農林學校英語和德語農學科有33/(6)，林學科則有33/9(6)，臺南高工外語課程相較之下課堂數減少許多。

商業與熱帶醫學的外語都是以專業實踐地而非學術專業來源國為第二外語。1930年代日本發動戰爭，在南進政策下中國語、馬來語成為外語學習的新趨勢。本文文脈用中國語而不用中文，蓋因當時中國北京話尚未成為通用語，所謂中國語是複數名稱，包含廣東話、上海話等等中國各地方言。1940年以後戰爭推進到中國東南沿海及東南亞，馬來話、廣東話不僅是高等教育機構的第二外語，一般民衆也興起學習熱潮，總督府開辦廣東語、馬來語的講習會，鼓勵許多人工作之餘學習這些外語。有些年輕人因擁有此一技能，應募為軍事口譯人員，前往戰地。

整體來看，在高等學校及大學預科對於外語及第二外語的課程時數與要求有其背景，戰前日本教育體制中，高等學校及帝大是高等教育中的頂層，具有精英教育的性質，在高等學校及帝大預科階段，必須先學習往後三年大學吸收新知，或發表專業研究所需的外國語，這可以說是明治時期大學制度由外國語專門學校轉變而來的餘緒。以實業教育為主的專門學校，因為比較偏重在技術應用層面而非學術蘊奧之研究，對於外語或第二外語的要求，則有偏重實用的傾向。

#### 肆、外國語文的學習與外國文化之瞭解

在諸多外語當中，英文是在中學時期必定要學習的語文，但在高等學校與專門學校，除了英文之外，德文等其他歐語系統語文也開始受到重

視。德文、法文在19世紀下半葉，已漸被視為新興的科學的語言，即使是在對自身文化、科學傳統自視甚高的英國，也難以否定此一趨勢。據說，與達爾文並列為自然天擇演化理論發現者的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從探險地香料群島（摩鹿加群島）返回英國後，曾經應徵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祕書一職，但結果由其好友貝茨（Henry Walter Bates）獲得該一職務，其原因卻是貝茨曾自修過當時新興科學語言的德文，較具競爭優勢。<sup>29</sup>

關於臺北帝大、臺北高校，以及農業、商業、工業、醫學等專門學校外語課程學生學習的情況，我們僅能就目前許多回憶錄或訪談，找尋一些蛛絲馬跡。其中，杜聰明的回憶最為詳盡。杜聰明畢業於臺北醫學校，學校課程中並沒有日文以外的外語課。當時日本醫學界，無論是研究學術或發表論文，多使用德文，醫學書原文亦多德文。雖然，僅有中學校程度的醫學校課程並不教授外語，許多想進一步發展的臺灣人只有自己加強外語。杜聰明回憶17歲進入總督府醫學校就讀時，二年級優秀的學長如王受祿、邱鳳翔、陳彩龍等已經自己進修德文。因此他也循著這些前輩的腳步，自修各種語言。

除了德文之外，杜聰明自醫學校畢業後不久，也向牧師、傳教士學習英文，並且在醫專教授時代，持續不斷的訂閱英文雜誌如*Japan Chronicle*、*New York Times*、*London Times*。

除此之外，他跟臺北高校德國籍教師以及後來醫專聘雇的德文會話教師Hans Sauter學習拉丁文。Hans Sauter是昆蟲採集家，來日本後與日本人德語教師結婚，德文之外，英文、拉丁文、希臘文均通曉。杜聰明提到外國教師教會話沒問題，但看到科學論文就頭痛，因此他的科學論文不論英文、德文經常都交給Hans Sauter修改。Hans Sauter常對杜聰明說：「今後

<sup>29</sup> 提姆·謝韋倫著，廖素珊譯：《香料群島之旅》（臺北：馬可勃羅文化，2003年），頁318。

學界是通用英語，比讀德文重要，應該要讀英文。」<sup>30</sup>杜聰明又在京都留學時期，跟隨日本教授學習法文，此後在醫專教授時代以及留歐期間也不斷學習法語。

杜聰明是一位相當有自覺的學者，他學習德、英、拉丁語、法語各種外國語，雖然不是學校課程中習得，不過，許多語言在當時的臺北都有修習的管道，相關國家領事館的翻譯官，高等學校、醫專的外國語教師（外國人）均有開辦該國語言的講習會。

學習這麼多國語言，吾人不禁好奇，杜聰明最欣賞那一國家的文化呢？以杜聰明認真嚴謹的用功態度，令人意外的他最喜歡的文化卻是浪漫著稱的法國文化。杜聰明自承留學英、美、德、法多國，最愛巴黎的留學生活。也許是因為巴黎市民輕快親切，帶有天才的氣質，以及學術研究的風氣，吸引認真刻苦的杜聰明吧。

臺北高校學生對甲類、乙類學科的選擇，如前所述，不管文科理科都分甲乙兩類，甲類科以英語為第一外語、德語為第二外語，相反地，乙類科以德語為第一外語、英語為第二外語。那麼當時中學生如何決定進入高校是要選甲類或乙類，就臺灣人的情況，當然以選讀理科最佳，因理科將來以大學醫學部或醫科大學為目標。文科臺灣學生人數很少，文科學生最好的出路是參加日本國家文官考試，對臺灣學生來說不僅要和全國日本人競爭，即使優秀考上，日後升遷狀況也不如同期的日本人。但是不管文科、理科，選擇乙類以德語為第二外語的人比較多。從一些回憶錄或訪談資料來看，通常他們以中學已經學過了英文，希望再多增加一種外文能力，選擇乙類。由於不論是理科系統的醫學或文科系統的法政，日本在這幾方面承繼德國的傳統，如果將來想進入法學部或醫學部（這在當時是出

<sup>30</sup> 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年），頁96。

路比較有保障的領域)，以德語爲第一外語的乙類都是比較適當的選擇。<sup>31</sup>

高等學校的教育是通才教育，雖然有分科，但文科仍有高等數學及自然科學，理科則有哲學與論理學（邏輯學），升進大學時，文、理科學生仍保有轉入別科的機會，升上大學才成爲專才教育。此外，高等學校對語言課程相當重視。一週內德語、英語、國語（日語）加起來有近20鐘點的語言課程，高等學校的老師會強調，身爲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具備兩種以上外國語文的能力，其中一種要能讀能寫；第二種至少要求做到能讀。<sup>32</sup>（日後吾人也看到杜聰明對此奉行不渝）。高等學校多種語言訓練的理想，不僅爲了知識的傳播，更是希望藉此培養學生的國際見識。

臺人就讀臺北高校的學生中，楊基銓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年輕的郡守（24歲即擔任宜蘭郡守，當時宜蘭郡管轄範圍是頭城、礁溪、員山、壯圍）。楊基銓出身臺中，臺北高等學校畢業進入東大經濟學部，他回憶中學時代英文能力很強，但是進入臺北高校之後他就讀的是文科乙類，以德語爲第一外語，所以教他們德文的都是資深的德文老師。相反的教甲類英文的則是學校資深的英文老師，當時臺北高校有全日本具知名度的英文老師，但是都教甲類。課堂德語學習之外，也讀課外的德文書，所以高校時代德文能力強過英文。當時東京帝大經濟學部考試科目僅德文（英文）與歷史。<sup>33</sup>戰後楊基銓在農林廳水產科準備考留美考試，反而必須重新學習中學時代以後就荒廢的英文。

關於臺北高校以英語爲第一外語課上課的情況，王育德的自傳有詳細

<sup>31</sup> 例如吳守禮與楊基銓都曾如此表示。參閱鄭麗玲採訪記錄：〈我和臺灣語研究〉，收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臺灣大學，2002年）。當然也有人表示因爲中學讀英文已經有一點基礎了，習慣了，而選擇讀甲類。鄭麗玲採訪記錄：〈許文發先生訪問紀錄〉，2001年12月3日，未刊稿。1940年許文發進入臺北高校就讀文科甲類，與其同班的有邱炳南（邱永漢）、王育德。

<sup>32</sup> 參閱張文義整理記錄：《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臺北：臺灣史料中心，1996年），頁75-76。

<sup>33</sup> 一般說來高等學校畢業生人數遠較全部帝國大學招收的學生數少，通常只要申請即可上大學，但因爲東京帝大是高等教育金字塔之頂，申請人數通常超過，才需要考試。



的描寫。王育德1940年自臺中一中四年修畢後，考入臺北高校文科甲類，也就是以英語為第一外語，德語為第二外語。如楊基銓所述，臺北高校有全國（日本）知名的英文學者，但都安排教甲類班，其中最有名的教師之一是島田謹二，島田後來任職臺北帝大。王育德一年級的英文老師則是小山捨月，五十分鐘的英文課程中大概有四十分鐘漫談，剩下十分鐘才趕緊回到課本，漫談內容大都是歐洲旅行所見所聞，橫跨西洋文化史。<sup>34</sup>名師島田謹二的英語課，與其說是教英文，不如說是藝術鑑賞。學生對於這樣的上課方式，通常不會覺得講一些不相干之事，是不稱職的老師，反而對該課程興趣盎然。這時的語文課程已不僅僅是工具型的語文課程，還包涵對該國文化的瞭解。當然，也有不好的情況發生，一向有自由主義之風的臺北高校，在二次大戰爆發後有一些老師思想亦受時代之影響，如王育德受教的德文老師瀧澤壽一，據稱此人富納粹主義思想，德文課以希特勒的演講集為教科書，動不動就稱讚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世界，使得學生中產生不少納粹主義者。這些學生常對自由主義教師如歷史課老師鹽見薰抱持敵意，甚至批評教師的授課，上課消極。<sup>35</sup>通常這些抱有納粹主義思想的日本學生對臺灣人的態度傲慢，甚至產生衝突。<sup>36</sup>不過，並不是修德語一定會沾染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德語世界有很深厚的哲學、文學傳統，常能開啓學生另一扇心靈之窗。

醫師郭維租是臺北高等學校理科乙類學生，他回憶理乙每週德語課很多，第一年幾乎每天都有一兩節課，英文則每週排兩小時。高等學校的學科訓練頗為紮實，更有不少認真的教授，如郭維租提到其化學老師常自己打字油印英文補充教材，使得這些約莫高中到大一階段的學生有接觸原文教材的經驗。<sup>37</sup>

<sup>34</sup> 王育德：《王育德自傳》（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頁195-196。

<sup>35</sup> 王育德：《王育德自傳》，頁196。

<sup>36</sup> 王育德提到他住宿的家庭長子和他是同學，原本一年級交情尚可，還曾一起參與辯論社南部演說之行，二年級後此君成為納粹主義者，兩人還曾到校庭決鬥。

<sup>37</sup> 曹永洋：《都市叢林醫生》（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頁68。

1941年以後的戰爭期間，三年制的預科與高等學校改爲兩年，暑假也要上學，以入學醫學部爲主的臺北高校理科乙類一週德文課高達16小時，（承平時爲9-10小時），4小時英文，這樣的密集訓練在一些學生的身上有很大效果。1945年戰爭結束之前，臺北住宿在外的臺灣人學生之間，有些人因爲唸日本人多的中學，家中也慣用日語，閩南話可以聽但卻不太會說了，因此同學間的溝通常混著話交談，據臺北帝大工學部預科生顏世齊之回憶：「……他們之間常混著話交談，臺灣話和日本話、英語、德語，甚至北京官話也摻進去。當時我還沒有學德文，葉英堃、廖述仁、陳震烈三位交談，差不多德文要占三成左右。」<sup>38</sup> 葉英堃、陳震烈是臺北高等學校出身，廖述仁則是臺北帝大預科醫類，三人都在1945年升入臺北帝大醫學部。這些資料讓我們對日治末期受高等教育精英之間的語言狀況感到十分有意思。<sup>39</sup> 前述的楊基銓曾提到當時德文教育基本上還是以閱讀能力爲主，聽、說、寫方面的訓練較欠缺，葉、廖、陳三人也許是比較特殊的狀況。不過，即將入學醫學部的學生彼此竟能以德語溝通，即便在會話中只占三成，也令人十分驚訝。

投身視障醫療的陳五福醫師，回憶臺北高校時期外語課程的語言訓練對他的影響：「學習外國語文的好處，在閱讀時尤能凸顯出來。以我來講，世界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我即讀德文原著。至於丁尼生的詩作，則是英文。而接觸這些外文書籍以後，深深的感受到，古代東方先哲的言論，與西方近代思想家，完全兩樣。然而其共同點乃皆以人道爲出發點，至於其思考模式及切入點，則大異其趣。」<sup>40</sup> 陳五福高校三年的德文教師石本根岸，是虔誠的基督徒，經常邀請學生到他家中，在該教師的引導之下，陳五福在高校期間涉略不少文學名著，除了哥德與丁尼生的著作

<sup>38</sup> 顏世齊著，藍博洲編著：〈顏世齊回憶錄第一部〉，《傳記文學》，77卷4期，頁104。

<sup>39</sup> 當然，吾人也許更應深思，一個人擁有這麼多種語言能力，到底算不算幸運？通常是弱勢族群才需要具備高強的語言能力。

<sup>40</sup> 張文義整理記錄：《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頁80。

之外，海涅的詩集、施托姆的《茵夢湖》、尼采《悲劇的誕生》、叔本華《意志與表象世界》、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佛洛伊德《夢的解析》等等名家大作，都是在高校這一階段閱讀的，不能讀德文原著的書，就讀岩波書庫的日譯本。<sup>41</sup>從這些西方哲人的著作中，陳五福學習到一種迥異於中國傳統教養的思想，雖然中國的傳統哲學如《孟子》、《莊子》的學問也蘊藏豐富的生活經驗與人生哲理，但若要培養獨立思考能力與高尚人格，陳五福卻較屬意西方教育模式，尤其在一個開放的時代重視人權及尊重生命的態度上，西方思考與理想透過語言課程，傳遞到東方。

這些外語能力，在他們日後求學、就業歷程中，常能不經意地帶來不少助益。以臺北高校理科乙組（以德語為第一外語）出身的蘇仲卿為例，1946年蘇仲卿自臺北高校畢業，卻正遇上學制前所未有的大變動時期，他最後進入臺大農化系，日後並成為該系講師，並到美國柏克萊攻讀博士學位。他提到當時柏克萊對博士班學生的要求是必須在第一年完成兩種外文考試並通過資格考。當時有人建議他以中文、日文兩種語文應考，必定能輕鬆過關，但蘇仲卿認為自己當了18年日本國民，現在又是說中文的人，怎能將中、日文當成外國語，於是決定以德語、法語應考。由於德語早有根基，很輕鬆的就過關，只有法文必須從頭學起，也在第二學期通過考試。<sup>42</sup>他們這一代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人，在歷史環境的變化下，因緣際會的擁有十分多元的外語能力，總讓身為後輩的吾人不知是該感傷，還是羨慕。

## 伍、戰後外語課程的變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臺灣在各層面都面對一個新

<sup>41</sup> 曹永洋：《陳五福傳》（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頁30-31。

<sup>42</sup> 參閱黃青真主編：《生風化雨—蘇仲卿教授榮退紀念文集》（臺北：藝軒出版社，1999年），頁103。



的時代。對新政權而言，清除社會各層面的日本色彩是首要工作，不過，政權轉換之初，不僅大學留用了許多日籍教授，一些研究機關也留用了不少日籍技術人員。但是，美英聯軍打敗德日義軸心國，受日本教育的科學技術者體認到美國時代已經來臨，許多人必須重新學習中學以後沒有再碰觸的英語，而德語作為學術語言的地位也面臨嚴苛考驗。

戰後臺灣教育制度面臨極大的變革。不僅是學制須與中國學制接軌，教育內容、教學用語都必須大幅調整與改變。首先在學制上，戰前日本以6-5 (4) -3-3 制，即小學校六年，中等學校五年，高等學校三年，大學三年的制度。<sup>43</sup>國民政府的教育制度則是美式的6-3-3-4，其中差異最大的是沒有高等學校及大學預科等制度，附屬醫學專門學校也因與中國高等教育制度有別，均面臨調整，其中臺北高校在最後一批學生畢業後廢校，大學預科先改為臺大先修班，最後廢止，日本舊制高等學校—帝國大學的高等精英教育制度完全退出臺灣。僅有醫學院系統的醫科、牙醫科仍有醫預科制度。雖然，這一套精英主義式的教育有許多待檢討之處，不過，在外語訓練及教養科目（通識教育）上卻值得讚賞。高等學校—帝國大學的教育，訓練出一批學養豐富深刻，又具有專業技能的新知識分子，不同於日後的中學—大學，一方面分科過早，大一、二通識教育則流於淺薄、教條。

在教學用語上，戰爭結束之初，許多教授即使有心用中文上課，不僅學生無法吸收，教授本身也無法順暢使用北京話的國語為教學用語，臺籍教授不能用北京話之外，外省教授的北京話國語也各有不同鄉音，讓原本就不諳北京話的臺灣學生更難以明瞭。（此一情況持續頗久，但中小學校國語教育發達之後，學生接受長年不同鄉音國語之訓練，理解能力提高）。1945年8月以後臺大醫學院、先修班的專門課程，仍然使用日語，醫學專門術語則用德文，很少使用英文。據當時的醫學院學生黃稱奇回憶，內科病理學教授葉曙是從中國大陸回來的教授，有一天上課忽然心血來潮的使用

<sup>43</sup> 五年畢業但第四年修畢即有報考高等學校的資格。

國語授課，講了約莫一小時後問學生如何，結果當然無人能瞭解，只好又恢復以日語上課。<sup>44</sup>

除了學生無法吸收之外，有時因為教授本來也是出自日語、德語系統，使得教學用語一時很難改變。同樣來自黃稱奇的回憶，當時婦科的吳嘉義教授急著改變教學的基本用語，他認為現在已經是英文的時代了，怎麼還在用戰敗國日文和德文，因此第一天上課醫學術語改用英文。只是沒想到自己卻經常把英文和德文術語混唸，弄得學生不知所云。<sup>45</sup> 臺大醫科畢業的彭煥章先生亦曾提到戰後學制轉換之初，日本時代已經是教授或助教授的臺灣人如杜聰明、李鎮源，在不能以日文為教學用語，但中文又尚未熟練到能授課程度的情況之下，竟是以德語上課。<sup>46</sup> 此一時期各學院普遍都有類似的處境。

1945年考入高等學校的學生，入學第一年就面臨時代鉅變。戰後結束之初，高校殘存，日人教授仍舊「照表操課」，照戰前的規矩排課，例如理科乙類仍以德語為第一外語，每週課堂數仍然很高，而英語課程少。前述蘇仲卿從學生兵再度回到校園上課，仍然留下來的日本老師從1945年10月起至1946年7月約九個月的時間，安排密密麻麻的課程，差不多把一年半到兩年的課程上完。在這些課程中，以德文為第一外語的理乙班級，語言課程完全沒有英文，一周上9節德文課，1節拉丁文，原因是老師們認為英文以後還可以上。<sup>47</sup> 但是戰爭結束後，新時代將是英文世界已經很明顯了，連學生都感受到危機感，<sup>48</sup> 覺得學如此多的德文，而不是英語是否正確。同時使用多年的日語不再是教學語言，中文成為另一個必須迫切學習的新國語。

<sup>44</sup> 黃稱奇：《撐旗的時代》（臺北：悅聖文藝，2001年），頁223-224。

<sup>45</sup> 黃稱奇：《撐旗的時代》，頁245-246。

<sup>46</sup> 彭煥章是臺北醫學大學彭雙俊教授的叔父，筆者和彭教授討論拙文的主題時，彭教授很熱心的提供了許多有趣的觀點與例子，在此感謝彭雙俊教授提供的各種資訊。

<sup>47</sup> 《生風化雨—蘇仲卿教授榮退紀念文集》，頁80-81。

<sup>48</sup> 蘇仲卿：〈我與臺大農化系〉，收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頁266。

戰前日本高等教育外語訓練的理想，影響了一些接受此套教育的臺灣人，成爲日後他們創辦教育奉行的理念。1954年杜聰明創辦高雄醫學院，他立志建立臺灣第一的醫學院，所以採取了日本高等學校的教育方針，注意語文教育。英文要求學生能讀、能講、能寫並有英文文學的教養。對於德文及法文也要有閱讀能力。杜聰明以其所接受的日本教育經驗認爲，在青年記憶力最強的時代，不論學生願不願意，高雄醫學院的學生一定要讀英文、德文及法文，以便畢業之後從事學術研究時能讀文獻。<sup>49</sup>杜聰明曾驕傲的提到，在他這樣的語言教育政策下，高醫藥學系學生前往美國留學，攻讀博士學位被要求英文以外的第二外語時，學生莫不感謝杜院長教育方針之正確。

1950年代以後臺灣高等教育的外語課程，吾人試以從臺北帝國大學改制而成的臺灣大學各學院學系來分析。目前所能看到最早的《國立臺灣大學概況》是民國44年度，課程表的資料是前一年度，因此我們所列出的是1954年各院系課程表。這一年也恢復大專軍訓課程。

1954年文學院大一、大二有共同必修課程，參考下表7：

表7：1954年臺灣大學文學院共同必修科

文一 共同 必修	科 目	學分數		文二 共同 必修	科 目	學分數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語言	國文	4	4	人文 科學	哲學概論	3	3
	英文	4	4		帝俄侵略中國史	(2)	(2)
人文 科學	中國近代史	2	2	社會 科學	社會科學	2-3	2-3
	三民主義	2	2		國際組織與 國際關係	(2)	(2)
	中國通史	3	3				
計		15	15	計		7-8	7-8

註：括弧數字表可選擇在上學期或下學期修課一學期。以下各表均同。

<sup>49</sup> 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頁222。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概況（民國44年度）》，頁9。

文學院英文共通必修一週僅4小時，一學年，沒有必修的第二外語課程，僅外文系有其他語文選修課，及哲學系列出6學分的德文為二年級建議選修科目，但是是否有具體的開課則不得而知。

關於臺灣大學法學院的部分，吾人以許文發先生的例子來看。許文發日本時代就讀臺北高校，之後進入京都帝大讀文學部，後來轉入經濟學部，不久被徵召當兵。1945年戰爭結束，雖然可以再回去讀京都帝大，但是去日本的交通困難，所以就近入學臺大就讀法學院經濟系。當時由於老師很少，許多課程是經濟系、法律系、政治系等系合上。經濟系留用日本教授很少，只有一個法語教授是日本人，主要師資來源有日本回來的臺灣人以及外省老師。許文發回憶：「臺灣人教師多用臺灣話或日語教學。教國語的外省老師，他說的國語卻讓人聽不懂。教經濟史的外省人，比較會教，國語也比較聽得懂。反正老師很缺，一些校外請來的老師，當官的，就隨隨便便教一教，甚至較深的他不曾教，就叫他的部下教，我們就像這樣有讀像沒讀。」<sup>50</sup>戰後初期不僅學制混亂，師資不足、來源也很紛雜，學生的學習常被不安定的制度干擾，無法安心學習。

<sup>50</sup> 據說當時教學很混亂，有些必修科目缺了不能畢業，可是沒有教授，竟然是學生自己隨便去找老師來教，學分隨便就給也不足為奇。參閱鄭麗玲採訪記錄：〈許文發先生訪問紀錄〉。

表8：1954年臺灣大學法學院共同必修科

法一 共同 必修	科 目	學分數		法二 共同 必修	科 目	學分數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語言	英文	4	4	人文 科學	國際組織與 國際關係	2	--
人文 科學	中國近代史	4	4	社會 科學	帝俄侵略中國史	--	2
	三民主義	2	2		哲學概論或 理則學	2-3	2-3
	中國通史	2	2				
計		15	15	計		4-5	4-5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概況（民國44年度）》，頁30。

雖然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政學科屬於法學系統，不過臺大法學院承繼多少原本文政學部政學科傳統仍是疑問，法學院以原來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為校地。1954年的法學院僅有法律、政治、經濟、商學系，除了英文之外均未列有共同必修之第二外語，不過除了法律系之外，其他三系都在建議選修科目開設二年級、三年級各6學分的德文、日文及法文，但是是否有具體的開課則不得而知。

理學院大一、大二共同必修課程科目與文學院差異不大，不過其中比較大的不同則是大二理學院規定了德文上下學期共6學分的共同必修課。除此之外，各系在三、四年級的選修課程中另開設有德文、日文、法文、俄文等科目，如數學系。<sup>51</sup>

<sup>51</sup> 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概況》（臺北：臺灣大學，1964年），頁31。



表9：1954年臺灣大學理學院共同必修科

理一 共同 必修	科 目	學分數		理二 共同 必修	科 目	學分數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語言	國文	4	4	語言	德文	3	3
	英文	4	4		帝俄侵略中國史	(2)	(2)
人文 科學	中國近代史	2	2	社會 科學	社會科學	0-3	2-3
	三民主義	2	2		國際組織與 國際關係	(2)	(2)
微積分		3-4	3-4				
計		15-16	15-16	計		7-8	5-8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概況（民國44年度）》，頁17。

德文作為理學院共同必修的第二外語課程大約持續到1965年。<sup>52</sup>心理學與地理系在1965或66年度取消德文為必修之第二外語，改列為選修。70年代以後許多學系的第二外語不再獨尊德文，改為多種語言任選必修，如數學系是德、法文。

1954年臺灣大學醫學院除了醫科不分系之外，有藥學系、牙醫學系。其中醫科為七年制，牙醫則是六年制，一、二年級均設在理學院稱為醫預科。醫學系與牙醫學系一、二年級共同必修科詳見表9。醫科三年級開設有一學年各2學分的德文課程。牙科則因是新設科系，沒有三年級以上的資料。藥學系在二年級有一學年各3學分的第二外語，但並未列出為何種外語。從醫學方面的課表來看，德文仍有兩年共10個學分的比重，但與戰前高等學校理乙、大學預科醫學類每學年動輒8至10學分的德語課相較已是縮減大半。戰後拉丁文則幾乎完全自臺灣高等教育中消失。

工學院與農學院的共同必修科如下表10、11。

<sup>52</sup> 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概況》，頁31。由於民國58年度的課程資料，目前無法找到，根據民國59年度的資料，臺灣大學可能是在1969年或1970年新增英文聽講實習為共同必修課，部分學系的第二外語課程也有改變。

表10：1954年臺灣大學工學院共同必修科

工一 共同 必修	科 目	學分數		工二 共同 必修	科 目	學分數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語言	國文	4	4	人文 科學	帝俄侵略中國史	--	2
	英文	4	4		國際組織與 國際關係	2	--
人文 科學	中國近代史	2	2	主科及 有關科 目	應用力學	4	--
	三民主義	2	2		材料力學	4	2
自然 科學	普通物理	4	4		工程畫	1-2	1-2
	普通化學	4	4	數學	微分方程	3	--
數學	微積分	4	4				
	投影幾何	1	1				
計		25	25	計		10-11	6-8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概況（民國44年度）》，頁41。

表11：1954年臺灣大學農學院共同必修科

農一 共同 必修	科 目	學分數		農二 共同 必修	科 目	學分數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語言	國文	4	4	語言	英文（二）	4	--
	英文	4	4				
人文 科學	中國近代史	2	2	政治學	國際組織與 國際關係	2	--
	三民主義	2	2		帝俄侵略中國史	--	2
自然 科學	普通物理 （化學）	4	4	計		6	2
	動物學	4	--				
	植物學	--	4				
社會科學：經濟學		--	3				
農業概論		3	--				
計		23	23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概況（民國44年度）》，頁50。



農學院是臺北帝大創校以來就已經存在的學部，不過，從本文第三部分所提到臺北帝大時期農學部預科學生的課程來看，農學部預科生每週要修5小時的德文、4小時的英文，第三學年安排一週1小時的拉丁文選修課。從臺灣大學教授背景來看，早期臺大農學還有不少日本系統，不過，在外語課程上，戰後臺灣大學的農學部對第二外語並無特別要求。

臺北帝國大學工學部成立於二次大戰戰況激烈的1943年，僅有兩年歷史。工學部預科生的外語課程配置比例，英語／德語三學年分別是每週(8/5)、(7/4)、(5/4)。臺灣大學工學院時代的外語要求僅剩一學年每週4小時(共8學分)英文課程。不論是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的共同必修科，除了外語課程的訓練大幅減少之外，政治味(政黨味)性質的學科反而增多，大大減損了大學的超然以及專業素質的培養。<sup>53</sup>

## 陸、結論

東方傳統知識與政權密切配合，形成一個支撐王(皇)權的階級，在日本這是傳統的武士階層，在中國這是以儒家經典為中心的士大夫階層。傳統中國知識分子要能熟習四書、五經，討論國家大政時能引經據典，從古籍中的例子找到處理今日問題的方法。閒暇之餘，三五知友品茗、飲酒，要能吟詩作對，附庸風雅一番。

明治政府所建立的仿效西方的高等教育，在制度的外表之下，實則雜揉了傳統東方精神。透過新式(西式)教育制度，明治政府培養了一批新的知識階級，以他們的知識與能力捍衛這個新成立的政府。新式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學校—帝國大學是新政權的腦袋，發號司令的中樞，專科

<sup>53</sup> 各學院的所謂人文學科中竟還有一學門教「帝俄侵略中國史」，真是聞所未聞的一種高等教育學科，反映當時「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的時代氣氛。另外，因為抗戰結束，對日本仍抱持敵意，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不僅教科書中充斥情緒性仇日描述，日文系不能增置，已設置的日文系不能直接叫日文系，要叫東方語系。

學校—單科大學與私立大學則是新政府行動的手腳。臺灣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最早透過日本模式接受了西式教育。但這一套日本西式教育制度引進臺灣時已經有過意識的裁切，首先是作為中樞的高等學校—帝國大學體制發展遲緩，並且對臺灣人限制嚴格，作為行動手腳的專門學校也是殘缺不全。

臺灣近代高等教育中的外語課程始自日本統治時期，但是在1918年臺灣教育令發布之前，並沒有對臺灣人教授除了日語之外的外語課程，甚至臺灣島內程度最高的醫學校也沒有英語教育，其他語文更不待言。由於日本對殖民地臺灣的教育，一直希望能局限在低度、有限的狀態，因此，只希望訓練容易指揮、熟練的低階工人、農民，既不需高等教育，當然更不必學習能夠吸收西方知識、技術的英語、法語或德語等外語教育。

不過，1913年臺灣士紳發起私立臺中中學設立運動，顯示臺灣人追求高等教育的決心不容易被壓抑，此後，殖民政府對高等教育在殖民地的施行，改採有限度的開放。1918年起陸續成立了農林、商業、醫學等專門學校，一方面滿足臺灣上層階級的要求，也滿足在臺灣第二代日本人的教育需求。隨著各種專門學校以及最後高等學校—帝國大學體制在臺灣建立完成，明治維新以來在日本所實行的這一套學制也比較完整的在臺灣施行。

日治時期臺灣的外語課程在高等學校（大學預科）—（臺北）帝國大學這一高等教育系統頂端，比較受到重視。因為這一系統的教育理想是要訓練帝國知識分子當中最頂尖的階層，他們必須具備至少兩種外語能力，不僅要能以這些外語為工具，吸收他國頂尖的知識，研究各種學問之理論與技術，更要能從這些外語中培養廣闊的見識，成為決定國家發展方向的首腦群。因此臺北高校（臺大預科）學生所接受的外語訓練（以及通才教育），即使過了六十多年的現在，仍為人所津津樂道。高等教育中各種專門學校的外語課程，除了強調溝通的商業學校之外，外語教育的時數少於高等學校—帝國大學體制，有些外語課程則是針對學問的實用地區來學習，而非學術來源國，例如商業學校中對中國語、馬來語等語言的要求。顯示

這些學校的學習目標著眼於「致用」，而不是窮究某一學問蘊奧之「研發」。

非西方國家外語課程學習對象的變化，透露西方學術霸權的變動與移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隨著德國戰敗，德語作為科學語言的時代結束，美國（英語）學術霸權更形穩固。吾人從戰後臺灣外語教育中英文教育比重與其他第二外語嚴重失衡亦可看出。戰後初期至少到1954年（或甚至應該更往下延到1970年）臺灣大學的外語訓練比較貧乏，不少院系獨尊英語，甚至從上課堂數（學分數）來看，對英語的要求亦不及日治時代高等教育體系。

戰前的高等農林學校農學科在1925年每週有超過10小時的英文課程，持續三年，並有一學年6小時的德文選修。戰後1954年的臺大農學院僅有為期一年半，每週4小時的英文，沒有德文等其他第二外語要求；臺大法學院的外語要求，甚至遠不及日治時期專門學校的高等商業學校。臺北高商的英文課程三學年18/16/16，每週上課時數相當高，而戰後法學院僅有一學年每週4小時的英文，兩者相差更多。

日治時代高等教育的特色是外語及第二外語，尤其在第二外語上，戰前的高等教育不僅是大學，甚至各類別的專門學校亦幾乎都有必修第二外語的要求，且在修課時數上也相當可觀。綜言之，如果吾人要問，日治時代臺灣高等教育的特色為何，筆者以為應該就是第一外語及第二外語課程受到高度重視。而究其緣由則可歸因明治維新以來西方教育引進之初以外語為教學用語之餘緒，以及對高級知識分子教養的理想。

筆者對於臺灣歷史上接受最完整的日式近代高等教育的這一世代深感興趣。成長於1920-30年代的臺灣人，進入近代高等教育體系中接受教育的人數已較前一代普遍。對於這一世代的精英，他們透過日本殖民統治接受了西式高等教育，西方價值觀、西洋式教養以及科學技術等，是否對其人格、心靈與人生有什麼影響或改變，一直是筆者很想知道的答案。他們怎麼去看待西方的哲學、宗教、人生觀，西方技術曾經讓他們感到何種的驚

異或感動，筆者認爲從外語教育的學習情況，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這些接受近代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和以往傳統知識分子不同，他們經由外國語文媒介，不僅培養了其專業知識，甚至也塑造其人格。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彙編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16年版。臺北：該校編印，1941年。

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概況》。臺北：該校編印，1964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該會編印，1939年；南天書局影印出版，1995年。

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各年。

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一覽》各年。

臺灣總督府統計書（各年）。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各年）。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各年。

### (二)文集、日記、回憶錄

中村孝志撰，陳俐甫譯，〈臺北帝大的日子〉，《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臺北：臺大臺灣研究社，1996年。

王育德，《王育德自傳》。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

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年。

張文義整理記錄，《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臺北：臺灣史料中心，1996年。

曹永洋，《都市叢林醫生》。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

曹永洋，《陳五福傳》。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

陳奇祿等，《從帝大到臺大》。臺北：臺灣大學，2002年。

黃青真主編：《生風化雨—蘇仲卿教授榮退紀念集》。臺北：藝軒出版社，1999年。

黃稱奇，《撐旗的時代》。臺北：悅聖文藝，2001年。

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

顏世齊著，藍博洲編著，〈顏世齊回憶錄第一部〉，《傳記文學》，77卷4期。

### (三)專書

大久保利謙，《日本の大學》。東京：創元社，1943年；玉川大學1997年復刊。

天野郁夫，《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研究》。東京：玉川大學，1998年三刷。

天野郁夫，《舊制專門學校論》。東京：玉川大學，1993年。

伍振鷺主譯，《亞洲大學的發展—從依賴到自主》。臺北：師大書苑，1990年。

多賀秋五郎編，《現代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東京：多賀出版株式會社，1983年。

吳文凱、楊清漢，《比較教育學》。臺北：五南，1992年。

高橋佐門，《舊制高等學校の教育と學生》。東京：國書刊行會，1992年。

喻本伐、熊賢君，《中國教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5年。

蝦名賢造，《札幌農學校》。東京：新評論，1991年。

霍益萍，《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四) 期刊、報紙、公報

《府報》第千百五十號，昭和6年1月15日。